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三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〇七期 ——
(二〇一一年七月五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7b)

【口述历史】	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上）	卜伟华等
【往事非烟】	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摘选）	王行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口述历史】

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上）

• 采写：卜伟华 • 徐绥之 • 编辑：卜伟华 • 米鹤都 •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米鹤都：《编者的话》见本刊 zk1102c：<http://museums.cnd.org/CR/ZK11/cr619.gb.html#1>）

卜大华 男，上海崇明人，1948年出生于苏北。1958年随父母到北京。文革前为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参与发起组织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曾任清华附中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月到延安地区插队。1971年至1973年，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六团当兵。复员后在沈阳化工部橡胶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

◇ 家庭和少年时代

我老家在上海崇明县。爷爷是贫农，解放后在村里当过贫协主席。我父亲原名卜文达，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华翔。他出生于1921年，阳历是7月1日，跟中国共产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父亲十几岁到上海当学徒工，后听说新四军在苏北盐城成立了抗大五分校，他就与人相约前往，参加了新四军。先上抗大，后在解放区做公安工作，当过公安局长，又当过海防团长。

解放以后，父亲进入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上学。他在校时是优秀学员，我见过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奖给他的一支钢笔，上面刻有“优秀学员华翔”几个字。毕业后他留校做教员。1958年，国防部五院组建，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搞导弹方面的尖端科研。父亲就调到了北京，我们那时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是保密的，单位对外称为0038部队。1965年，五院改组为七机部，父亲在七机部一院一部，当政治部主任，就算集体转业了。

我母亲叫李新亚，参加革命也很早，一直在新四军的总部，开始是做妇救会、群众工作，然后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协理员。1953年复员，到南京白下区委工作，以后就一直当小学的校长。

我出生在苏北的如皋，1952年随父亲搬到南京。我小时候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生活比较单纯。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干部子弟的感觉，那时候是部队子弟小学，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父母亲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教我要为人正直，实事求是。

我10岁左右来到北京，上的是东高地小学，有很多工人家庭的同学。同学之间没有什么界限，甚至生活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上小学时，不太努力，但学习成绩很好，属于那种老师不太好管，总有自己的主意的人。虽然从入队的第一天就是小队长，到我摘下红领巾时还是小队长。

我从小小学就爱看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书很多，什么《三国》、《水浒》、《西游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因为上课看课外书，书几次都被没收了。记得有一次，我看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就和同学说，朱德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长。有个老师，真当回事来找我谈，说你不能瞎说。我说，这是真的。这件事印象很深。

1961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初中我们班50来个人，干部子弟也就五、六个。全班有18个人在小学时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学生总体水平很高。清华附中有个优点，它对学生要求不是特别严，作业负担不是很重。我们住校，全天在学校里，所以经常有时间到圆明园去玩，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我初中三年，大致是一个从不很努力，到开始努力学习的过程。

我初二时比较闹，一年受了两个警告处分。清华附中有几个不能违反的“天条”，一是不许打架，二是不许顶撞老师。我犯了第二个“天条”。在外语课上，老师错怪了一个同学，我打抱不平，结果越说越激烈，最后账算到了我头上，受了个警告处分。学校还有一个规定，旷课10堂，要给个警告处分。另外还有个规定，迟到4次算一次旷课。因为是住校，尤其是早自习、晚自习，作息时间把握不严。有时候到清华去，回来时自习已经开始了，结果就给记上了，我还不知道。到期末，我们班有十几个人受了处分，都是迟到多次累计的，能把人气死。

初三大点了，很努力，一下子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时北京市教育局执行金质奖章、银质奖章、优良奖章的制度，我初三得到了北京市的优良奖状。这一年我考上了本校的高中，感觉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困难时期刚过，学校也变得很活跃。

新来的同学在一些方面很强，有些可以说是站在教材之上学习的，邝桃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初中时就把高中的数学学完了，开始读大学的数学。我感到非常震撼。邝桃生知识面很广，不过有时候不够严谨，我们俩辩论的次数特别多。到冷泉农场下乡劳动时，我们俩能够从晚上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有时候睡一个钟头就起床。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辩论题目。

涉及哲学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审美的阶级性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啊，还有历史方面的“李秀成自述”等等。几乎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都会引发辩论。高中时期，是青年人的思想、心智比较开放的时候，对很多新知识都感到好奇，每次辩论，都会促使你更关心某一方面的知识。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开始有政治活动了。我是1964年入团的，觉得很光荣。那时候，学校开始对干部子弟有一些特殊的教育，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成立了射击队、报务队、60炮队等一系列的民兵性质的队伍，进行军事训练，还准备参加大比武呢。我因为视力不好，所以就到了工程兵队。二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学习。有时候礼拜六下午自习课的时候，学校把干部子弟集中在一起学习。1965年，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对毛远新的谈话。这好像是在高一下学期。这种学习不多，还传达过毛主席和王海容的谈话。我觉得教育意义还挺大的，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因为毛主席谈了一些学习，谈了一些人生，说不要读死书，上课不愿意听可以打瞌睡。听了这些东西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1965年，我们附中设了预科。从高二开始，从原来的六个班里选出两个预科班。预科班开宗明义，就是以上清华大学为目标。搞预科就是为了与大学建立更加密切的衔接。预科班的学习打破了原来教材的范围。数理化全部用自编教材，而且打乱程序，高二时学物理，高三学化学、立体几何。高二数学一直讲到高等数学知识。语文课强调“一篇文章定胜负”，只考作文，写得好就通过，语文基础知识基本都不考。如果你认为你能把命题文章写好，语文课也可以不听。数理化的老师清一色都是原来清华的教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学习方法，对我们的思想活跃有很大的好处。

那时候发表了“九评”，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气氛越来越浓了。我开始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当学校的团干部、班干部，也是一种锻炼，也是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途径。而这个途径应该让更多的学生去接触它。也就是说，班干部、团干部，重新打乱，让更多的人担任班干部、团干部，得到锻炼。

因为高三的学生要准备高考，主要精力放在准备高考上。学校就拿我们预651班作改选干部的试点，拿出了一份名单，交给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是毕业留校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当时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副书记，跟我们比较谈得来。这时候，我、骆小海、邝桃生几个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说，希望这次改选幅度大一点，过去经常当团支部书记的，这次最好不当。过去没有当过班干部的，这次最好多选一点。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就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学校是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学生干部是培养接班人的途径。应该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这个途径，接受这个培养。我们班为此事讨论了很多次，在板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最后，我们说服了班上的大多数人。我们班为什么后来那么团结？就是因为思想活跃。

我们提出骆小海当班长，还提出班委会可以精简，一个班长，两个副班长，一个管生活，一个管学习。再有一个体育委员，一个文艺委员。五个人，很精干。被选的几个人特别激动，非常愿意把事情办好。

团支部的改选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们班团员很多，一个班48个人，有40个团员。原来准备选我当团支部书记。后来学校让我到工程兵队去当队长，说你当了学校的干部，就不要再兼班里的干部了。这是学校对我们的反制，他们不想都按我们的意图去做。于是在确定团干部的时候，他们来了这么一招。最后，我们推选另一个同学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个人考虑和恩怨在里面。那时候的讨论，没有以势压人，也没有多少阶级斗争的内容。有的人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的人刚入团不久，这回当了干部都非常高兴，

干劲很大，效果很好。这件事是个前兆，学校领导不高兴，对我们的班主任也不满意，认为她太软，整个改选过程被学生牵着鼻子走。但也没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不好，只是我们的一些做法和他们原来的想法不一致。

不久，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1〕，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讲的是要破除框框，破除迷信。小海以后在他的《心路历程》中说，所谓造反，就是不要做精神奴隶，就是不要被传统的东西束缚。小字报贴出来以后，我们认为很好。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我们有点狂，开始有意见。

1966年4月30日前后，我们组织了班里十多个同学到潭柘寺去玩。自己带上挂面，背上两个铝锅。坐火车到房山，然后就走路，玩得很高兴。那时候，脑子里开始有了阶级斗争的弦，经常谈到阶级斗争了。有天晚上，住在戒台寺的大庙里，我们谈起最近中央出了很大的事情，听说了罗瑞卿被揪出来的事。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辈子不会很平淡了。

◇ 红卫兵出世

我们跟学校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66年5月10号。校长做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我们对这个报告有意见，希望找校长或分团委书记谈谈。后来我们又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了学校的问题。

附中的分团委书记顾函芬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非常不高兴。她说：学校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行了，你们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1957年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我们也很抵触，于是矛盾就加深了。晚自习的时候，学校对全校广播讲话时，点了我们班。说有的班，对学校工作指指点点，这不好，这很危险。如果附中的领导一开始不是用压服的态度，可能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结果，这天下不了晚自习后，很多同学都跑到我们班来看我们的小字报，了解情况。因为我们几个在工程兵队、射击队和学生会上担任职务，和外班接触比较多，在全校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时，高三的王铭、张晓宾开始介入了，使我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王铭原来是四中的，他讲了四中在1965年四清中的学潮，涉及到教育路线和阶级斗争问题。清华附中之后的事情也开始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

到了5月下旬，我们与学校领导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尖锐了。学校开始搜集我们的材料，把我和骆小海、邝桃生的学籍卡片拿到校长那里，准备要整我们了。我们为了给学校提意见，也开始搜集学校在运动中一些做法的材料。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校长还去我家了，也就是告状。我爸爸对吴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5月18号，我弟弟卜伟华说他们要给学校写大字报。我还到他们班，劝了他们半天，不然的话，他们就第一个把大字报写出来了。我说，不要写，写了我们就被动了。不写，我们还可以继续提意见。王铭、张晓宾5月2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2〕，但这件事没有和我们商量，是以后告诉我们的。

那时候，我们经常是晚自习完了才去圆明园聊天。学校就采取了一些行动，加强校卫队，晚上9点学生一律回宿舍，到时候就锁门。我们谈完回来，学校大门紧闭，敲门也不开，我们只能从旁边的垃圾道钻进去。结果发现有人把很重的暖气片放在垃圾道的上边，弄不好就会掉下来砸着人。

矛盾逐渐激化，我们越来越明显地被当成另类处理，干脆不妨就自当那个另类。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一些共同行动了，我就建议，高二、高三几个班的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有更大的力量。那时批“三家村”，几个人一起写文章，就署一个共同的名字。我看到张承志他们写小字报时用了“红卫兵”这个名字（3），我觉得还不错，于是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骆小海说，曾经使用过“红卫士”的名称（4），这种说法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可。也可能有的班、有什么人用过，但我们肯定没有统一使用过这个名称。因为使用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提议的嘛！

5月29日，我们高二、高三几个班的同学在圆明园聚会的时候，确定了要共同行动和采用统一名称的原则，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这一天就算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开会的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除了陶正，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后来有人问我，那时候是不是上面有人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指示或暗示之类的东西。这个绝对没有。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严谨的组织，只是为了搞一些统一行动而采用的名称。而且对到底要搞多长时间，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已经入了“另册”的，在学校里已经没法活动了，很多同学对我们也是侧目而视。我们就经常下了晚自习后到圆明园去，搞到很晚才回来。学校里有一部分人支持我们，但大部分人还是愿意跟着校领导走。本来以为，我们会受很长时间的打击，前途未卜。没想到转机来得挺快。

◇ 对抗校领导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以后，写大字报的形式被肯定了。学校专门把五楼大教室开辟出来让大家写大字报。我们红卫兵的第一篇大字报（5）就贴出来了，就是要表一个态。谁同意都可以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是第一个签名的，最后签了一百多个名字。

伴随这个大字报，出现了一大堆反对我们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等等。学校的力量大，我们的力量小。我们就一天提一个问题，一天贴一张大字报。从6月3日开始，外校的一些学生听说了红卫兵的事情就开始来我们学校来看大字报。我们的第一篇大字报一直保持在那里，一看就很明显，红卫兵是少数，那么多都是骂我们的大字报。外校一些同学看到清华附中在围攻红卫兵，他们也来贴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署名就用不同学校的红卫兵。

6月8号那天，外校来的人特别多，有百十号人，都是骑自行车来的。学校一看受不了了，就强调纪律，把学校大门锁了，不让他们进来。附中的同学，在操场集合，学校领导讲话说，我们的党支部是革命的！我们呢，就走出校门，向各个学校来的同学介绍情况。我们在外面讲，里面就群情激昂，后来外面也群情激昂了。那天还特别热，外校的同学在校门外呆了10个小时，最后学校还是让外校的同学进来了，在学校里转了一圈。

就在那天，我们送外校的同学走。在圆明园的时候，突然听说学校里来了工作组了，就赶快赶回来。

当年的工作组组长刘晋后来在一篇文章讲了工作组进校的缘由。6月8日中午，胡克实紧急给他打电话说，清华附中一些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受到压制，他们处境困难，要刘晋马上派人组建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支持革命，支持红卫兵。我估计这可能是根据之前红卫兵几次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做出的决定。

工作组进校后，旗帜鲜明，马上就表态：支持红卫兵。6月9号，我和骆小海在教学楼争论了好长时间：学校领导是资产阶级黑线，应该怎么定义我们和学校领导之间的斗争？是不是敌我矛盾？最后认为是敌我矛盾，但根据表现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我们发了最后一篇批校领导的大字报。之前，我们只是说学校领导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大字报，说学校贯彻执行了清华党委、北京市委的东西，而清华党委和北京市委都是黑线。然后还有毛主席的那句话：整个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所以，我们和你们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把校领导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边。

◇ 《三论革命造反精神》

工作组进校后，我们很高兴，开始时和工作组的关系很好，亲密无间。工作组跟我们协商了一下，哪些人参加革委会，很快就成立了一个革委会。

当时他们提出可以有一些不是红卫兵的人参加。我说，看群众推选吧，能推得出来就参加，推不出来就不参加。工作组可能是想推马云香出来，马云香是学生党员，实际上也是红卫兵，但不是核心人物，关键是她自己也不愿意出来。

我们和工作组在许多问题上是一致的。首先是在批斗学校领导的问题上，坚决不能武斗。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工作组没有任何矛盾。所有批斗校领导的场合，只要有我们参加，都严禁武斗。我记得第一次批校长万邦儒的时候，好多同学都上去打，我就坚决地给拦住了。

另外，我认为批校领导也应该实事求是。红卫兵第一张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题目是《揭穿一个大阴谋》，批判校领导贯彻高教部的“四一七”文件，要把文革的批判引导和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正好这时报纸上也在批判彭真要把文化革命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我们找了华北局、北京新市委等，都没有说这个文件是毛主席批准的。于是我们就判断这个文件肯定未经毛主席批准，是个“反动的”文件。特别是5月份学校还把这样的文件拿出来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个大阴谋。这是我们当时批判的重点。开始批万邦儒的会是由我来主持，但后来我就不主持了，因为有点变味了。会上提出好多非常荒唐的问题。例如有老师揭发：校领导积极准备复辟，曾经派总务科长到延庆去视察地形，学校民兵有枪，他们准备枪支，准备搞反共基地。这些事情学生哪知道啊，不过我一听就知道是没影儿的事，但你主持会，还不好反驳他。

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几次问我：“你们红卫兵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给不出名单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我就说：过些时候，让各班核心组统计一下吧。这样一来工作组就不高兴了，认为我有意隐瞒。还有，在工作组第一次写的汇报材料中，就流露出对红卫兵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其实工作组来了以后，红卫兵就没有再单独活动。而各班的一些活动，你又不知道谁是红卫兵。他就说红卫兵的一些活动背着工作组。还有一次，工作组曾经要求我们红卫兵去支持石油附中的红卫兵。但我们有点怀疑，就到石油附中调查一下。一了解，挺复杂。我们认为这不能干。后来工作组带了一些人去，但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参加。这件事刘晋在文章里没有提到，其实这在我们和工作组的矛盾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的社论，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团结大多数。我们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6月24日，红卫兵针锋相对地贴出批判这个社论的大字报，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那几天，我们对运动怎么搞，也有些不满情绪。有一天我在二楼，随手翻着报纸，一下翻到了6月9号《人民日报》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我发现其中有毛主席关于“造反”的一段文字，我就到图书馆去查，后来在《新华月报》上找到出处，是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纪念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的。

“造反”这个词，使人有震撼的感觉。一般人看来，造反还是一个很负面的词。而在我们这些人中间，造反这个词已经是正面的了。那天我说，我们谈造反精神，该怎么写还怎么写，但是先不用这段语录。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实际上是抒发一种情绪，表达一种政治思想，是要打破原来框框的思想束缚，并没有针对工作组的意思。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工作组的脸色非常难看，认为是针对他们，或者是针对《中国青年报》的。我向他们解释，造反是要造旧世界的反。后来有两个人把这张大字报转贴到清华去了，这一下不得了了，大学生们一下子都跑附中来了，铺天盖地冲着红卫兵来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当时我们对工作组说，这种情况你们再不管，我们要反击了。工作组也不说话，他们是乐观其成。

等他们闹得差不多了，我们把第二篇《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拿出来了。第二篇就把毛主席那段造反有理的语录引在上面了。刘晋当时就楞了：“毛主席这么说过？”我们就解释，毛主席确实这么说过。我还告诉他们这段话出自哪里。工作组也跑到图书馆去查。第二天见面，他们一句话都不说。这第二篇也贴到清华去了，清华的大学生们一下子也全懵了。等于是7月4号，我们揭出了一个谜底，说明了我们说的造反是怎么一回事儿。

◇ 工作组抓坏人

但工作组不高兴，他们写了两篇反映我们情况的东西。一个是《文革简讯》第四期，一个是《文革简讯》第十期。其中提到，对红卫兵这样的组织将来要采取融化、融合的办法。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工作组来了以后，红卫兵就不发展了，因为再发展没有意义。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面对学校领导的压力。现在红卫兵成了左派了，要发展，人人都可以参加了，没有什么意义了。原来是无意识的，没有发展组织，到工作组撤出后，我们就是有意识的不发展组织。那时候我们很想把整个学校团结起来。

刘晋对我说，你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些人，很能干，但有缺点。缺点就是不听话。

清华附中工作组写的《文革简讯》，我们通过其它学校的同学知道了。有的学校工作组禁止学生成立红卫兵，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学生们就说，那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什么可以呢？工作组回答，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非法组织，我们有文件的。四十七中的学生就来向我们反映了这件事。邝桃生把这些事都记下来了，后来邝桃生的小本子丢了。被人捡到交给工作组了，工作组就对邝桃生不满。

还有就是对红卫兵主要的负责人王铭不满。王铭的父亲曾是罗瑞卿的秘书。所以要整红卫兵，王铭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如果动了王铭，就动了你的筋。这一招是胡克实出的。胡克实认识王铭的父亲，跟他们家也很熟。胡克实告诉刘晋，应该点出他们红卫兵里有坏人，坏人就是王铭，他父亲就是罗瑞卿的秘书，就是一个黑帮嘛。刘晋觉得这事不好办，一直没有点名，但他也明显地疏远了王铭。

清华附中学委会，王铭是主任，我和张晓宾是副主任，骆小海、邝桃生等委员也都是红卫兵的。7月15号，工作组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突然成立了临时分团委。宣布分团委的书记和一个副书记都是工作组成员，另一个副书记是张晓宾。分团委有九个学生委员，其中红卫兵只有张晓宾和高洪旭两个人。他们说，今天开完会以后，各班马上讨论，成立团支部，选举团支部领导。在开完大会后，我们就布置各班回去改选团支部，结果，各班的团支部书记都由红卫

兵担任了。我也被选为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刘晋专门跑来跟我解释了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工作有些侧重，你呢，主要负责革委会的工作，晓宾呢，将来让他负责团的工作。其实我也不用安抚。我说，我现在是团支部书记，我听从分团委的领导。

第二天，工作组又宣布，清华附中去200人到河北沙城参加军训。并通知我：大华，部队出一个连长，学生出一个副连长，你去当副连长。其实我们已经通知下面了，红卫兵能不去的就不去，因为感觉快要跟工作组摊牌了。我不愿意去，就说让高洪旭去。工作组也同意了。但晚上又把我找去谈话，说大华，你还得去。我们还得出一个副指导员，你当副指导员。反正是死活要让我去，我只好去军训了。

过了两天，工作组通知，工作组和革委会的人要在一起好好谈一谈。我说，好吧。这次谈话是在7月18号的晚上。与工作组对话，我们也做了一点准备。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这时候的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刘晋做海淀分团的副团长了。工作组是有备而来，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呀。既然说开了，我们就每一个问题谈了我们的观点。我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红卫兵组织要消融，红卫兵组织里有坏人。我希望工作组能够指出来，红卫兵里的坏人是谁。

当时王铭也在场，但他一声不吭。后来刘晋出去了，实际是去给胡克实打电话。那天晚上红卫兵和工作组交换意见的会，是根据胡克实指示开的，而且说要在会上点出红卫兵里的坏人。刘晋在电话里对胡克实说，我们正在开会呢，我们要不要点名？胡克实说，点，一定要点。这些事刘晋在文章里没写，这是他后来在批判胡克实的会上说的。

刘晋打电话回来继续和我们谈，指责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另搞一套。我们说，你们写的文革简讯中是怎么说的，能不能也给我们看看？谈了一会儿，刘晋又出去打电话了，胡克实都肯定地要他把红卫兵里的坏人点出来。这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张路宁他们来了，他们告诉我们一些新情况，说团中央好像受到中央的批评了，胡启立现在很孤立。我们认为和工作组的矛盾发展下去肯定关系要破裂，但破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最后就僵持在那儿，我们要求工作组把红卫兵里的坏人点出来。刘晋最后还是决定不点名。因为点了他就没有办法下台了，就可能和红卫兵彻底分裂了，这个学校的工作就不好做了。刘晋说，这次交换意见就到这里，工作组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是欢迎你们提出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7月27号下午，小海跑到我们军训的地方说，现在学校变化大了，听说工作组有问题，要撤销了。我问，和工作组翻脸了没有？小海说，还没有。

小海从沙城回去后，第二天就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的会，在那个会上，小海和邝桃生把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交给了江青，请她转给毛主席。

7月30号，部队通知，所有的学生今天一律回校。

◇ “我热烈地支持你们”

回学校我很高兴，我带队还没到学校呢，邝桃生就找到我说，团中央召集一个座谈会，咱们俩去参加。于是我们就急匆匆赶到团中央去开会。

到了那里，人还没到齐呢。一会儿，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进来了。胡耀邦问我叫什么，我

说，我叫卜大华。我反问了一声：“您是谁啊？”他说：“我是胡耀邦啊。他是胡克实。”。胡克实说：“卜大华，我知道你。”

胡耀邦主持座谈会，他说，今天开个会。过去，我们派工作组下去，跟大家有些意见不一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几个学校的代表都发了言。我还没谈呢。又进来两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团中央的几个书记全站起来了，我们也都站起来。张春桥转了一圈，最后坐在我旁边。发言的人继续讲。张春桥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他说，我知道。张春桥是什么人，中央文革是干什么的，我们那时都不知道。但看起来，他们比团中央的几个书记还牛。

后来我发言。我说，团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一开始支持红卫兵，我们也很感激，我们全力配合工作组的工作。但是后来工作组做的一些事情，使我们很不满意。例如第四期和第十期的文革简讯。这些都是别的学校同学反映给我们的，我们认为团中央应该检查一下这个事情。胡耀邦一边听一边还做记录。

8月1号那天，我们搞了一个横渡昆明湖的活动，全校900多人一起从龙王庙游到排云殿，大约有六七百米。那次是武装泅渡，都穿着衣服下水。当时水上红旗招展，我是最后一批下水的。我想做点好事，用一条船把剩在这边的鞋都运到对岸。但鞋子太多，一运到那边，谁都找不到鞋子了。真是办了一件特愚蠢的事。不过总算没出什么大事，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的中学生恐怕是没人敢组织这种活动了。

第二天，8月2号，就传出了关于毛主席给我们写信的事儿。那天中央文革打电话来，让我和王铭去钓鱼台找王任重。那次见过张春桥以后，知道有个中央文革小组，但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也不知道王任重是何许人也。

那天下午，我和王铭到钓鱼台以后，王任重自我介绍：我最近到中央来工作，我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派我联系你们四个学校，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向我反映。我派秘书跟你们联系。王任重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讲话很干脆。

王任重说，主席给你们写信了，这是文件，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这封信，是矿院附中的杨冀平〔6〕传出来的。杨冀平在学校宣读了这封信，马上就传开了。有人从石油附中抄回来这封信给我看，我当时就相信它是真的，认为别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不过，我还是感到很震撼。毛主席一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后面又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那时候就有一种想法：一定要把这个学校搞得让大家都满意。

我们没有对王任重表示已经知道了这封信。我看到文件上面印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之二。看完文件，就完全肯定了毛主席来信的真实性。

我说，我把它带回去行不行？王任重说，主席给你们写信，就等着寄给你们呗。我说，我抄下来行不行？他说，最好别抄。这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到旁边的房间去打了个电话。我说，昨天主席那封信的抄件还在吗？你念，如果有错的地方，我告诉你。当时是王玉平在那里，就把我们得到的抄件念了一遍。我看了一遍，可能有一个字的错误，基本上是准确的。

回校的路上，我和王铭商量，第一，中央文革小组主动和我们联系，多了一条途径。这是个好事儿。第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出现，本来和上面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自发的。今后做什么还是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不能依靠这个，就是不能每天打一个电话，问上边我们该怎么做。当时就定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给大家传达了一下，说，这封信我们看到了，是中央文件，但信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在信没收到之前，我们一律不对外宣传这封信。凡是中央没有说的，没有正式公开的，我们都不要去引用它。直到9月份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的时候，也没有把这封信加在里面。在写其它文章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一次提到毛主席的这封信。我们那时有一种近乎顽固的纪律性，这在其它很多方面都有表现。

8月4号，总理带人到清华大学，一个是看大字报，一个是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那天，总理带了很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来清华，都坐在前边。因为我要发言，也坐在前边。我周边坐的是刘宁一、廖承志等。刘宁一还问我，你知道我女儿吗？她叫刘菊芬。我说，知道，我们很熟悉。

大会一开始是辩论大学的问题。后来就轮到我们讲话了。我和小海、邝桃生，我们三个上台发言。我们念了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还讲了红卫兵的过程，讲了跟学校领导、跟工作组的斗争。然后是总理讲话。

总理讲话中肯定了我们红卫兵，他说：“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

然后总理就讲清华的问题。那天，总理好像特别急躁。总理可能知道这是主席的意思，要为蒯大富平反。但一般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个情况，还对蒯大富有着较深的成见。我们是置身事外的，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总理那天的讲话，比较凝重。

◇ 《紧急呼吁书》

到8月5、6号，我们学校还没有什么事情。但有些同学出去，听到一些事情。就是工作组撤出以后，很多学校发生打人的情况，特别是打老师、打学校领导，有的地方还打工作组。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我记得，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那天，我们还考虑是不是在学校开个会。后来，徐浩渊到我们那儿，讲了很多别的学校打人的情况，可能也讲到了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的事。我认为她讲的情况很重要，打人的事情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在一些没有高中生的中学。我们学校还有个革委会，红卫兵，工作组撤了以后，还有一个临时的权力中心。很多学校突然就变成权力真空了，每个人都可以去支使别人，为所欲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徐浩渊说，四、六、八中，还有北大附中，今天晚上要在天桥剧场搞一个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幅对联的辩论会。这个事情不能这样下去，我们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当时，我力主要痛下决心，以我们的名义出面，发表一个东西，明确制止打人现象。

徐浩渊开始是和我两个人谈，后来我找小海，又找晓宾，大概没几个人。这个事还是谈得很顺。大家同意写，这边就叫小海赶快写，那边找人打印。写的时候，觉得两个学校力量还是小了一点儿，决定再拉一个学校。我知道北航附中红卫兵里有一部分人，也是讲究策略的，他们内部当时就有鹰派、鸽派之分，起主要作用的岳小东、陈复晓等人都是鸽派。当时可能是让

晓宾给他们打的电话。打电话后，北航附中的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就用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个学校红卫兵的名义，写了《紧急呼吁书》（7）。

文章打印出来以后，我们就坐车到天桥去了。徐浩渊也是神通广大，她告诉我，可以进去几个人，可以有一个人上主席台。那天我们紧赶慢赶到了天桥剧场，本想参加辩论的，但还是晚了。进场以后，辩论已经过去了。结果整个辩论情况我们没掌握。然后，我就直奔主席台去了。主席台上的彭小蒙问我：你是谁呀？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她说，我知道。这样，我上了主席台，就散发我们写的这个东西。中央文革里，我认识两个人了，张春桥和王任重。我就给他们两人发了，接着又给主席台上每人都发了一份。

当时江青正在讲话。她说，你们不要上当，这是过去窦尔敦的东西。她讲完以后，下面情绪还很大。接着康生上去讲话，他上去就对我们这个呼吁书做了完全的肯定。他说：这个东西非常好，这是一个辩证法的东西，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东西，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可见当时中央文革这些人的心里都有数。就是工作组撤销以后，很多学校存在一个权力真空状态，确实出现了很多打老师、打同学、打工作组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呼吁书，他们都觉得非常及时。

康生讲完了，王任重说：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东西。我建议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念一念。

这时候，江青把我们叫到后面的化妆室谈话。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师院附中的汤二七，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们一进去，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什么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又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讲到这个地方时，我就想，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这时候，后面还有一个人，在那里记笔记。江青一回头看见他了，就问：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大人吧？那个人说，是，我是新的团市委的，我是支持革命小将的。江青大声说道：啊！？你是来当密探的！你就去告诉他们吧，就说我不怕他们！你去告诉那个胡耀邦，胡耀邦过去还是个红小鬼，现在我看像个胆小鬼！就是谎报军情！她的这一通话，我们也不是很了解背景，但江青发怒时非常厉害，那个人吓得直哆嗦，赶快出去了。然后江青再回过头来对我们讲：我建议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我说，我同意这样改。我不记得小蒙和汤当时有没有表态，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回来以后，我跟好几个人讲了。第一次见江青，我觉得主席的夫人应该是像慈母一样，感觉应该有更多的倾听，更多的关爱，循循善诱，这样一种形象。没想到是这样，声色俱厉的样子。这跟我想像中的主席夫人非常不一样。当然，她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对我们还是很好，很客气。她在对刘平平，对团市委的干部讲话时又是一种特别严厉的样子。那天回来我想的就是关于江青的事，对我们的呼吁书起了什么作用，反而没有想得很多。

我们印了有一二百份《紧急呼吁书》，都发光了。它后来被印发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很多领导干部都能看到它。后来我们在串连时，在外地也看到《紧急呼吁书》被翻印四处张贴。

◇ 自己管理自己

1966年8月份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组撤离学校，真正进入了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时期。一开始，我们是完全没有准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开始很兴奋。

8月8号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十六条”。我们非常仔细地听了，觉得非常及时。我们觉得，应该尽快有人来管，把运动纳入秩序。十六条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组成革命委员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学校像我们这么认真地按十六条办事。因为我们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必要。我们决定，我们的革委会也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来产生。

第二天，我们到图书馆里去查《巴黎公社史》等有关巴黎公社的书。图书馆里关于巴黎公社的书还不少。从中我们归纳了几条：分区选举；分区提出候选人；最后是剥夺极少数反对革命的人的选举权。既然有最后这样一条原则，那就会有人被剥夺权利。我们当时经过讨论，决定剥夺4个人的选举权，因为他们一直反对红卫兵。这一条应该说是不对的。选举的事情就交给了宋柏林，一是他办事很认真，另外他来得晚，跟学校里多数人不很熟，在选举中可以避免嫌疑。

第二天，我们就把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跟大家做了解释，然后各班回去酝酿候选人，准备全校选举。各班都非常认真，尤其是各班的红卫兵，提了好多意见，如初中应该有几个代表，高中应该有几个代表，老师应该有几个代表等等，提了好多方案。

我印象革委会一共是13个人。教师有两个名额，一个是刘长生，一个是霍童先。全校一千一百多人参加选举。除了初中的代表和两个老师代表得票没超过一千，其他人都超过一千了。那天在教学楼前开大会，每个班都在会上介绍自己班的候选人的情况。我们这些候选人都坐在前排，那天的选举挺顺利。

第一届革委会有我、王铭、张晓宾、邝桃生、骆小海、韩军、杨盘、高洪旭、郝秀芳等，第二届换了好多，有刘沛、袁东平等，具体人记不太清楚了。委员选出来后，然后再分工。我的意见还是王铭当主任，虽然他有些事不好管了，但我的意见还是让他当。三个副主任，晓宾管组织，我管宣传，杨盘管后勤，宋柏林当政治指导员。

那几天，我们就想着尽快搞出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来，也希望北京市其他的学校也能尽快成立革委会，把运动纳入一个有秩序的范围内，不要出现权力真空的状况。我们成立革委会以后，写了个总结，交给王任重了。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十六条刚刚出来几天，你们就已经有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喜出望外。他写了一个按语，我看到了这个按语。按语说：主席、总理、文革小组各同志，清华附中自己筹备，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经验很好，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推广。王任重在希望学校尽快恢复秩序这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特别是看到我们的紧急呼吁书，还有这个东西，对我们非常赞赏。

那时候，四十七中有个红卫兵被几个小流氓拿刀扎伤了。北京中学生在新市委支持下筹备开一个斗争会。在人大附中筹备了有五六天，我们学校骆小海、邝桃生参加了这个筹备会。在筹备大会的时候，就曾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要严惩小流氓，应该把这个当作主题，我们认为，这个事件是偶然的，但在文革中发生这种事又是必然的。为什么是必然的呢？就是原来执行政策存在问题，于是就想把它引向政治方面。

8月13号北京市召开了大会，主持大会的都是学生，但是筹备工作新市委都参加了。那天，我们学校上主席台三个人，除了骆小海、邝桃生，还有一个。我准备了一个发言。

那天开会，刚把小流氓押进来，突然从观众席上跳下来一个学生，拿着个皮带，从挺远的地方跑过去，全场的人都看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啪啪啪地打了起来，大家看着看着，忽然都鼓起掌来。这使其他人受到鼓舞，呼啦啦从观众席上跳下来一大堆人。我说，不得了，这事要管。我先冲下去了，对维持秩序的几个人喊了声：跟我走！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原来我也没有参加筹备会，但是我看到这个事，觉得不能不管。我和那些要打人的人几乎同时冲到，我一把拉住一个，“不许打！”我非常严厉地制止他们，那几个跟着我下来的人开始不太敢管，看到我很坚决，也就很坚决地制止他们打人。把别人都挡住了。当时要不及时拦住，真会把人打死了。这第二轮的打人虽然拦住了，但还是打到了，因为我也挨了打，一开始有人就打到我身上了。后来我就赶快让警察把他们拉出去了。

大会最后是李富春代表中央讲话。他说，团中央过去执行了一套资产阶级的路线，长期以来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代表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在这么一个会上突然宣布这么一个决定，使整个会场感到惊讶。但还是很高兴，因为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出的，大家对团中央还是有气。

那天回去的时候下了大暴雨。我们淋了雨还是感到很兴奋。但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就是打人。

8月16号下午，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团中央，要炮打“三胡”（8）。那天去团中央之前，高653班的胡德华找我谈了一次话，介绍了他父亲胡耀邦的情况，他是怎么参加革命的，以及在文革前调到陕西省任省委第一书记时也是倍受打击，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便血、尿结石，说有时候上厕所，疼得躺在地上打滚。文化革命前不久才回到北京。他原原本本跟我讲了以后，我也觉得直接管我们的是胡克实，这事不应该再跟胡耀邦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所有批判团中央的文件里，都把胡耀邦的名字去掉了。

当天下午，从团中央的造反派那里就只把胡克实“借”回来了。

第二天，我们在清华礼堂批斗胡克实。那天主要是刘晋发言。刘晋说：我揭发胡克实是怎么镇压红卫兵的，我们工作组跟红卫兵之间的很多事情，都是胡克实一手指示操办的。比如那天晚上，我们跟革委会交换意见，胡克实同志三次打电话，强调要我点出来，王铭是坏人。但是我没有点。批斗会中间，台下几次有人喊，让胡克实跪下！胡克实就真跪下了。我在台上，就把他拉起来。我叫他站起来，他腰伤了站不起来，直哆嗦，我就把他拉起来。有那么两三次，我都把他拉起来了。

会后我们跟胡克实聊了半天。我们问胡克实，处理我们学校的问题，都是谁的意见。他说，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都是中央的意见。每天晚上我们都向中央汇报。开完批斗胡克实的大会后，工作组这一篇就翻过去了。实际上，我们跟工作组所有的矛盾，都掌握在内部，没有完全公开化，始终没有变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事情说来也很有意思，文化革命以后，王铭成了胡克实的女婿。

注释：

1. 1965年下半年，《光明日报》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清华附中预651班的讨论很激烈。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1965年10月28日，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了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

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骂造反的异端分子：‘你们疯了！’”

2. 1966年5月20日，清华附中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其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讨论）。在当前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5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按语后，清华附中有相当多的同学认清了学校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错误，纷纷要求党支部开展‘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里’的讨论。然而清华附中的党支部躲躲闪闪，一直不公开表示态度。他们一方面不准对学校工作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话，另一方面，四处宣传，歪曲或夸大学生提意见中的某些错误，企图制造舆论，压制和打击学生的正确批评，情节较为恶劣。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两年、三年以上，而且大多数人是清华附中团委会、学生会、班级团支部及其他学校工作的学生干部。我们对于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了解得比较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党支部提出批评，均未得到党支部郑重的答复。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爱的党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错误言行。我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个革命一定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别是要落实到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3. 张承志，清华附中高642班学生，他在《红卫兵时代》（日文版，日本岩波新书1992年版，第39—40页）一书中写道：“班里的运动形式是在教室里贴小字报，凡是共青团员都要负责联系一至两名要求入团的同学，我和我负责联系的周向明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在我们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征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红铅笔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名字写在小字报的末尾，并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我最初以‘红卫兵’署名的小字报，不是以后红卫兵式的东西，也不意味着‘造反’。”

4. 骆小海在《宋柏林日记》一书序言中说：“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红卫士’被采纳，并改为‘红卫兵’了。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

5. 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字报全文如下：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6. 杨勇上将之子。

7. 《紧急呼吁书》全文如下：

红卫兵紧急呼吁书

最近，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混蛋和一伙不听毛主席话的糊涂虫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公然违犯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到处殴打一些人，打伤了许多好人和工农革干子弟，捣毁机关学校，进行流氓活动，有人竟敢乘机肆意毁坏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发泄自己对革命的刻骨仇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这一切，都严重地破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着革命左派的威信，破坏着党的威信，破坏着毛主席的威信。

我们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最大的愤慨，我们强烈地反对这些流氓行为！我们要正告那些混蛋：党中央和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交给了我们自己闹革命、自己领导自己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十分信任我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希望。但是你们滥用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肆意玩弄这个历史使命，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辜负党的希望，把伟大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庸俗下流的歧途，你们对得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吗？你们对得起看着北京的全中国人民吗？我们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你们也喊“造反”，但是无产阶级造反同流氓造反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再一次严正声明：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右派流氓胆敢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真正的革命左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造修正主义的反，我们造反，毫无私心杂念，绝无争权夺利，从不脱离毛泽东思想，从不脱离党的政策，是革命的高水平的造反。而你们除了不分好坏地乱打一顿，就是要流氓，实在低级，这叫什么左派？你们是假左派，伪红卫兵，伪红旗！

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

（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要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我们认为，有一些同志出于一时义愤，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党和毛主席亲手交给我们的自己闹革命、自己闯出新道路的伟大历史使命，忘记了党的政策，乱搞一通或者为坏人利用。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同志们，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决不能去损害党的生命。我们只能最主动、最积极、最勇敢、最坚定地捍卫党的生命。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最好地、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自己闹革命的光荣、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依靠革命左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师生，一斗、二批、三改。把我们的学校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让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放心吧！！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8. 指当时团中央的三位书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未完待续）

~~~~~

## 【往事非烟】

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摘选）

• 王行国 •

### ◇ 作者前言

#### 1.我为什么写日记？

文革中全社会掀起“红海洋”浪潮，家家都挂毛主席像，还有一轮红日在大海波涛上冉冉升起的大幅墙画。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唯独我家没挂。一个邻居好心地替我们做了画，劝我挂上，我谢绝了。

无论群众怎样地轮番批斗，无论专案组如何蛮横施压，我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不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

清队期间，校副书记刘铁岭在检查中承认包庇“坏人”王行国。我知道这是为揪出我做铺垫，是学校当局的既定方针。但是我忍不住心中的愤懑，去找主持会议的革委会副主任康辑元质问：“凭什么说我是坏人？”老滑头把问题推了出去，让我去问刘铁岭。我问刘：是你把我留校的，是你领导我的工作的，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凭什么说我是坏人？

一次，在专案组集体审我的会上，我不承认专案组强加给我的罪名，据理争辩，以至对方理亏词穷，只得仗势咆哮：“是我们审你还是你审我们？！”

我崇敬刘承秀老师壮烈殉节抗暴；我鄙视乞怜“给我留条狗命就行”的屈膝，我鄙视“带着感情唱”牛鬼蛇神嚎丧歌的奴颜。

因此，四中革委会机关报《新四中红卫兵》说我，“拒不认罪，顽抗到底。”

这就是我的性格。写日记是性格使然。

写日记是我对压迫的反抗，是我对现实的困惑，是我对未来还抱有希望。劳改队没有自由，但是人心是锁不住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却触及不了灵魂。在强权和野蛮面前，我是个弱者，让低头我就不能昂首，让自侮就得骂自己；但在记录历史上我不弱，我要把文革罪行记录下来——哪怕只是星星点点，留给自己，留给社会。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还有过这样黑暗荒谬的岁月，还有过这样丑陋的历史。一位友人在见到我写的记忆时，不无调侃地说它是“变天账”。说来也有道理，文革的天必须变，它的账必须算。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这是革命烈士陈然的一首狱中诗。在把这些日记托友人藏之山窝的时候，我曾步其韵反其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只能低下高贵的头，  
却无时不在企求自由。  
毒刑拷打难以忍受，  
总有一天我要开口。

## 2.日记是怎样写出来的？

日记是利用监管的空子写的。

文革初期乱抓乱打，行动野蛮却管理“粗放”。看管的是值班学生，每周轮换，在整治人的方法上各立各的规矩，各有各的邪招，互不衔接。他们的水平只停留在打骂和折腾“牛鬼蛇神”上，他们的精神头用在胡闹取乐上。“牛鬼蛇神”只是供发泄野蛮欲的“大玩具”。对“牛鬼蛇神”是群体性的集中看管，没有专案组一类的盯人审查。

“牛鬼蛇神”每天的学习主要做两件事：学毛著，写检查或学毛著心得，此外就是，不时在屋子里挨打和被拉出去挨打——接受批斗，后来增加了半天劳动。至于毛著是怎么学的，检查是怎么写的——以至于是不是真的在写检查，就没人管了。日记就是在“学习”的掩盖下写的。虽然总是提心吊胆，但一直没被发觉。

然而，仅此而已。后来二进宫——清队再次被揪出来“隔离审查”时，便再也没有写日记的机会了。

清队是由富有整人经验的干部和教师组织领导的，清队给他们提供了发挥才能和向上爬的机会和道路。伙食管理员出身的周春芳，登上“红色政权”革委会主任宝座之后，小人得志，大打出手。他们不遗余力地一批、二批、三批揪出学校教师，关进“学习班”。校园里一片杀气。

这时对“牛鬼蛇神”的监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严格、精细。

作为重点揪斗对象，我受到特殊待遇——囚在单间牢房，全天候有人专职在身边监守，家属探监要经过搜身检查，哪能有偷写日记的机会。虽然后面还有许多“精彩”内容，60多次批斗，被喷气式滴血满校园……却一个字没有留下。

## 3.日记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因为多年挨整，我较早地预感到形势的危急，对过去保存的许多文字材料做了处理，我曾经在南郊农场负责管理全西城区和部分北京市的“右派”，积累保存了大量反右运动和“右派”改造的细致和生动的材料；我积累有大量学生工作和学生思想心理的材料，这些有价值材料都被我付之一炬。回想起来十分心痛。

但是，我保留了文革牛棚日记，我深知它的不可取代的社会价值。

保存必得转移。

转移日记就是转移风险，谁不知道，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

但是，有人毫不犹豫地收存了我的牛棚日记。其人是红五类，现役军官，他把我的日记收存在大山窝里的老家中。我的日记进了红色保险箱。

顾准说过：“写日记要借写思想改造笔记作掩护。若被发现，则罪加一等。但如果不写。顾准将不复为顾准，良心不复是良心。”我不敢与顾准先生比肩，但是下面所记确是被作为“阶级敌人”在“群众专政”的“牛棚”中冒险偷录的史实。当时，一旦被发现，其灾祸不可想象。因此，笔者不能纵笔直书。因此，今天必须以特殊的视角来重读。不管怎么看，它都是历史的、不掺一滴水分的“原装货”，是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常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2011年3月5日

#### ◇ 日记摘选

1966.8.4 星期四

早上广播通知，9点工作组向全校作检查，之前学毛著。

8点半多，广播了×××在校外“以革委和党员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宣布开斗争大会。

外面喊声很大，在开大会的教研组小院已聚集了许多人，都在齐声呐喊。搭起来的高台子被围得紧紧的，上面有了不少人，只见台上有标语牌“打倒杨滨”在晃动。我感到不只是斗争×××。

不久，一群人揪着屈大同过来了，头上被戴着用铁丝纸篓编的高帽子，跟着的人一边打他，一边把他揪上了台。

我心情感到有些紧张，但还没想到会揪我。

随后，一个叫×××的学生和几个人从我身边经过，突然像是发现了我，一声“你也去”，便连推带打地把我往台上送。一路上经过层层人群，吃了几下拳头，都还不重。到台前才看见上面已经跪了一些人，有的头上戴着高帽子，背上插着牌子。人群把我按到台上靠边跪了下来，头被按得低了又低，因为靠台子边，就不断地吃来自台下的拳头，还有人死劲掐我胳膊（后来发现破了），有人抓了一把泥抹在我头上。

台上有人招呼“不要打”，后来才打得少了点。

不断有人被揪上来。

后来有人讲话，以后让“牛鬼蛇神”自己“报名”，只学校当权派杨、刘、俞、屈说过之后便没再报下去。

又过了些时候，宣布“牛鬼蛇神游街”。被揪出来的人被拥着排队沿400米的操场跑道转圈，在人群的“夹道”中，在拳打和脚踢的推动下蠕动。一些学生以打人的狠毒程度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水平。我前面的黄庆发，被令边走边敲一面破鼓，一根胶皮管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有人扯着。后来姜春荣被推到了我前头，让他打擦，几次催她使劲。她没有“帽子”，披头散发。

路上常有泥坑，有人沾了泥水往“牛鬼蛇神”身上擦，有人拔了青草带泥往身上摔，有人用湿泥、石子打，有人拿木棍打，各种“武器”都被派上了用场。

后一段路上，有人塞给我个破锣，让用手打，后来又有人塞来个破扫帚打。因是只许低着头，所以前后周围的情况都看不见。然而却令人强烈感觉到，这种火爆的场面焕发起人群空前的“革命热情”。

从操场回来之后，这些被游街人都被圈进原教导处屋子，先头进来的人已勒令跪在那里，后来的人也纷纷被按下。屋子前后包围着学生在呼喊。

过了些时候，让站了起来。暑热天气屋子闷得很，被塞进来的人都在浑身出汗，直往地下滴答。

这时看到我前面的石磊光着一只脚，史会仁也是。

突然，孟吉平晕倒在地上，过了不久又爬了起来。后来让屈、孟都坐下了。方护士被找了

进来。张升的右眼睛青肿得很厉害。

后来拖进来个学生。他大喊大叫，听说叫××。×××狠命地打他，不让他分辩，说他是反革命，冒充工人出身。

后来让都坐了下来，看管的人说现在出不去，先在这呆着。

以后宣布：打你们应该，保护是为了让你们好好交待。说有的学校往身上浇开水，对你们这还是客气的。

下面让大家发表“感想”，人人都得讲，并进行录音。计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黄庆发、张升、王钊、史会仁、王修言、廖锡瑞、孟吉平、王行国；以下是三个学生：任正吉、韩保安、栗钧；也有没让发言的。以上总计教师19人。最后让大家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也录上音。

让发言的内容一般是：这是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完全拥护，今后要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师生监督下，老老实实改造。最后是高呼毛主席万岁！

后来在全校播放录音。

以后反复广播了红卫兵革委会的通告：支持革命群众今天的革命行动。

5点多钟，有人把这些人召到小饭厅“学习”，让每个人谈今天的想法，然后写成书面的。

石磊、姜春荣一直在哭。

为“保护”这些人，不致“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出事，要这些人集中住在学校。这是我没想到的。晚饭也是在这里吃的，进出都有人“保护”。还不错，晚上睡觉有人给送来毯子。

前此一二天出现有高一班“革命学生”的大字报，理化教研组“革命教师”6人署名的 大字报，要求搞“牛鬼蛇神游校”，说“不这样不足以平民愤”。

#### 1966.8.5 星期五

早晨醒来以后，扫过地，别人陆续来了，杨滨第一个。

一天都是让自己读毛著。革委会来人提出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合考虑自己问题的性质。有人写，有人读，各不相同。

上午10点钟，突然外面传来呼喊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下意识地感到将是又一场风暴。我系上鞋带，把身上的钥匙摘下来放进书包里。

不一会儿革委会的××进来说，外面同学要求给里面人挂牌子。第一个被叫出去的是杨滨，回来时已是瘫在两个架着她的人身上了。以后专设了个老师看着她，单独关在里屋。下面顺序叫出的是刘、俞、屈、徐、王钊、黄、廖，之后便终止了。

我心跳了。我禁不住哭了，说不上是怎么个心情。

#### 1966.8.6 星期六

从今天开始，这些人被监督劳动，在学校工厂干活。

监管的人很“严格”，不断地喊“快点”，“不许偷懒”。外面看热闹的极多，各个窗口坐满了人，多有品评，间以骂声。

劳动之后，每人要在本上记录产量数字，接着不吃饭学毛著。

后来的监管人高二五班，非比平常，吃饭、睡觉，一切都在屋子里看着（以前只在门外胡同口把着），出入都手持木棒尾随。

中午睡不着觉。

#### 1966.8.11 星期四

革委会宣布：一些人由于“民愤极大”，剥夺选举权。其中有我。共12名教师：杨、刘、屈、俞、黄、廖、徐、王（钊）、张、史、曹、王（行国）。

又宣布，赵、石、王（修言）解放。（孟吉平已不在在。）

又宣布，底下不得交谈个人问题，不得同路回家。

我认为剥夺我的选举权是没根据的，是不对的，我不同意。但我又能怎么样。

没写完，学校的集中学习就解散了。路上，脚步沉了又沉。7点多钟，太阳已经下去了。一路上想……

1966.8.12 星期五

广播剥夺掉14人的选举权（前者再加周春芳、王希哲）。随后，让唱《牛鬼蛇神嚎丧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认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认罪。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我只能哭歌。

看管人骂，“哭是装蒜”。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一些人被点名“独唱”。

心乱得很。也许我只有作一个懦弱者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倒下去？我想，首先还要和当前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谈谈。

我要替自己作些解释，我之“罪”和我的态度都不足以到此程度。

路上，心在翻腾。

少了一个选举权，多了一支哭歌，不过如此而已，还不是最后的结论。就是成了“牛鬼蛇神”，也不倒下去。不，应该说相信党和群众会得出正确结论。

白天有人给屋里人照相。

夜里有人沿街叫骂“王行国王八蛋”。

1966.8.15 星期一

开始了又一周的监督劳改和管制生活。

上周令做的事情有：写被打后的想法，小结对自己问题的认识；通读《毛选》一卷、语录、毛泽东诗词。

晚上出来的时候，秋雨淋淋，雨中的校园透出清新，也许是最后几瞥了。

考虑并着手准备一些以后的事情，几架子书籍资料，无所留恋，清出几本。一箱子“历史”材料，抽几份也就足矣。

每日得嚎歌三五次，非如此不得食。劳动之间亦要加此一曲，给围观的人作表演。一批红领巾被带到车间“参观牛鬼蛇神”。

1966.8.18 星期四

上午，全校大部分人都去参加庆祝文化大革命百万人游行大会。令“牛鬼蛇神”在操场拔草，10点多回屋。×××给开了电灯。我想到这是一种关照，并联想到一些人还是比较稳重的。

不久，提前结束了“学习”，却拥进来一批人，其中有校外的，要求唱三遍嚎歌，供展览。来人中发笑声不止，并进行拍照。这时我才知道刚才开灯的用处。不知照了几张，只见最后是对着×××的“特写”镜头。

总结今天的教训，的确的确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的东西就可以坚持。

下午劳动中监管学生带着原在校办厂工作的张升到我面前来，说我的劳动方法不对，让张升加以分析。我表示不同意，并说明我原本在校办工厂就是指导这项操作的，实践这样干活快，质量较好，废品较少，工具较省。不料，待劳动结束时，这个监管竟宣布王行国“违反操作规程”，罚加半小时劳动。随后带着几个人一起过来，大加训斥：“你过去还不是牛鬼蛇神哪！”“你过去还不认为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最后的结论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1966.8.19 星期五

让听广播：昨天，清晨5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就来到天安门，并到广场上的群众中去，身穿军装，和群众在一起6个多小时。林彪副统帅和毛主席肩并

肩在一起，并在大会上讲话：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创举。

红卫兵作大会的标兵和站在观礼台上，红卫兵给毛主席系上红臂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群众一道庆祝文化大革命，迎接新的高潮。

一场大雨下了一夜一天，之后，便觉秋凉了。今天上下午都穿了长衣服。夏天过去了。

宣布史、廖解放，下午仍劳动。这样的共6人。集中监督劳动的10人（杨、刘、屈、俞、徐、黄、王钊、张、周、王行国）。

1966.8.20 星期六

早晨有几个红卫兵站在门口，给每个人抽了几皮带。

×××、×××几个人进来看了一阵，把人拉出去照相，嚎歌。

人围得多了。后面几乎全是初二四的。

昨天晚饭后不少人都对我与监管学生的争执发表议论，略有几种：

一种是，要“老老实实”。黄说，这样自己吃亏。徐说，他说什么你听着，别说就完了。张说，你吃这个亏不止一次了，要不你早该解放了，你有什么？

一种是，要从“政治着眼”。×说，这不是讨论技术的时候。

一种是，认为学生作得对。刘说，这样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对革命负责任。

今天，嚎歌规定排队进行，前排是挂牌的跪着，中排低头弯腰，后排站着。

晚上下工后由杨滨谈陪斗张文松的感想。之后，革委会人提出，在新革委会选出之后，要对“牛鬼蛇神”展开斗争，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

1966.8.22 星期一

记得烈士诗抄中有这样一句话：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饴。

目前处境是够苦的了，必须要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这个力量只能来源于这里。心志既坚定，就能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任何不利处境。

今天一天有不少新鲜事：

一路上见到许多张贴的传单，多是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要求改变红绿灯，要电气车挂主席像，不许收房租，取消定息，改校名，改街名……

学校扣着三个据说是冒充红卫兵的“骗子”。一个个连遭几次好打，鬼哭狼嚎。之后，令其爬行。个个蓬头垢面。把男的弄个“鬼剃头”，女的则披头散发，被揪去一些头发。有人威胁要用刀子切其手指，有人说要用棍子把其打瘫。

这周高三一班值班，对我们一些人的监督又有突变：

1.打得多。随处打，随时打，监管人×××等手执皮带和弹簧鞭，不间断地在人的周围转，声称“我认识你们，这家伙可不认识你们”，“在我们学校对你们宽大多了”……

挨到我身上的有：转圈对每个人打了一遍，嚎歌头低得不够挨打，看书头低得不够挨打，嚎歌报“衔”不全重打，最多的还是在单独出去打水、送饭盆的时候连遭毒打。在院子里打人的人遇到别人夸他的时候更来精神，对每人就更重地打几下。

2.勒令人人剃光头。先给刘铁岭、张升剃了个阴阳头，然后令他们向大家发表“感想”。有人看着理发，把人剃成“花头”。收费从贵，每人2角（原价1角）。我、刘、黄三人全收1元。

3.嚎歌另加每人“独唱”，唱前每人要报“衔”，令我报的是：“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大右派。”人人要弯腰低头，否则打。

4.待遇从苛。劳动不许带水，休息时间不许休息，得嚎歌，吃不完的饭不许送回，限制抽烟，收去了火柴，抽烟时不许同时读书报。

5.要求从严。一句话不许说，读书写字要直腰挺胸端坐。问话必须齐声回答，有未应声的连打，上厕所所有人围打。

我从星期六开始，再吃不下定量的饭，所有人的饭也是越剩越多。头，一天晕晕乎乎，时时作疼，周身如在云雾中，读书纯属装门面。

1966.8.23 星期二

原来“学习”的屋子用来囚禁从外面抓来的一些人，叫“模范监狱”。我们这些人先转到音乐教室囚禁，又转到工厂的仓库。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革命小将，称改变旧商号、旧街名称的行动“好得很”。革委会组织讨论，让就此写思想汇报。

有人到工厂找钉子木头做枷锁。

中午减少菜量，晚上没给菜，吃的咸菜。

晚上，组织对一天劳动的批评自我批评。

1966.8.24 星期三

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路上看到两个合作商店被封闭了。

各校许多“流氓”集中在我校看管，今天打死了一个，监管人组织我们讨论，让发表感想。让人们说，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

洗碗回来，被三个学生截住，让我嚎歌作乐。

让我到另屋取壶，正赶上死人，没让进，等待时有人用皮条不断抽打头脸。

今天嚎歌都是拉到院子里，让一个个跪着“独唱”。

午饭的油饼换成窝头，监管人不让给应得数量的汤，就是咸菜。

晚上谈完感想后，令韩、任2人跪着互相抽打嘴巴。

现在，被监督劳改的人分作以下几种情况：

1.半天劳动：张育达、郭玉如

2.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

3.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督：张升、王行国、周春芳。

4.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管、挂牌：杨、刘、屈、俞、徐、王钊、黄。

被监督劳动的学生有：任正吉、曹群和、康铁铸、苏秉初、韩宝安、赵恩平。

1966.8.25 星期四

到处是一片紧张气氛。晚上回家一路上无数小孩拦截不点灯的自行车，白天在房管所看到排大队的人群在交房产。

校内广播了高一一班要求老师下到班级（接受批判）的大字报。

四中散发了管制和遣返“四类分子”回乡的通令。

红卫兵成立了×××等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

下午出去拉料，到沙河中越公社，有人押送，一路不得抬头。回来照旧躬身嚎歌。感到疲累。三次被批评头低得不够，东张西望。

晚上刘铁岭和张升被叫了出去。听到有“老实点”的挨训声音。以后宣布，刘、张、王行国“劳动偷懒耍滑，不老实”。

同时宣布，黄庆发表现较好，要大家学他。以后指挥生产的事由他管，不许刘铁岭再管。

×××夹起了尾巴，他说“只要给我留条狗命就行”，整天把身体躬得像个虾米，差一点就可以折叠起来。这就是老实？！

我不是他那样的人，学不来。

这周高三一直值班。管理本无一定之规，谁人都可加码，增添“节目”，加上以后就“定型”了。这周加上的是拉到大饭厅前院子里嚎歌，晚上加了“学习”，上午减了休息，吃饭时间与一般人区别开，任何时候都要低头。

“牛鬼蛇神”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1966.8.27 星期六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迅猛异常“向前发展”。

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发出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解散各组织。

“革命敌人进行阶级报复”，发生几起拒绝红卫兵检查，向红卫兵“行凶”事件。晚上组织讨论，要大家认识“敌人的报复是阶级仇恨的集中表现”，在监督劳动中要对人民群众驯服老实。

学生清理了学校图书馆，烧了“坏书”，并提出各人回去清理自己的图书。校内红卫兵向黑六类出身的学生提出“革命的考验”，要求他们带领红卫兵检查他们的“老巢”。“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蛋”。

上午，在院子里挑玛钢件时，有几个学生嚷着：“那里没人看，快去打！”先让曹家骏嚎歌，曹报名时说是扫地出门的富农。学生不依，有人打他，说他是地主。

以后让我嚎歌，报名。我说是“牛鬼蛇神”，学生不依，非让说是“混蛋大王八蛋”。我不说，几个人就打起来，先头用手打，以后拿树枝和皮条，最后拿木杠子打。监督人说我不老实，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让我放老实点，让我跪下来。直到后来又来了一个监管学生才让打的人停下手。

不久，革委会的马凯来了，问那个刚才打我的学生：“你们是红卫兵吗？”他们说不是，马说“不是红卫兵不许随便打人”，说他们“趁火打劫”。

刚才挨打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反正是难免的，这时倒不免有点眼泪盈眶了。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心里却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1966.8.29 星期一

革委会的××要求各人回去对家中作清理。星期日清理了书籍等，拉出三十多本今天带到学校上交销毁。

今天上午，有一系列重要的广播。其中有清华附中对目前运动提出的意见。本校革委会对抄家进行总结，红卫兵总部提出对抄家的要求。

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强调贯彻政策，非“黑五类”不查抄。之后放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眼睛不免湿润了，泪水滴了下来。

这周开始的第一天，比之上周有所不同：几乎没有打骂，上午和下午都有了休息时间，可以抽烟。我想这不单是由于监管人员换班（本周是高三四值班，有郭学孟、秘增凯、梁圭宣等）的关系，也是政策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

生活得稳定一些，精神也好一些。

1966.8.30 星期三

俞汝霖把一些古书交了，让大伙去搬，有三四千本。

一天有两批外地来的红卫兵“参观”，都让作了嚎歌“表演”。

1966.8.31 星期四

广播“破四旧”，破旧字号；破流氓；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抄黑五类分子的家。

还有改革一些旧风俗，如土葬、服装、发式。

1966.9.5 星期一

这周换初三三班值班，对整治“牛鬼蛇神”的恶作剧，进行了新的“编导”，一下子又加了好多“规矩”：

1.监管的人人手携带一件“武器”，随时随心所欲对每人加以殴打。其中有人举着一件名为“专政鞭”的武器，要求每人应答，答不响亮的要受打骂。

2.弯腰规定一定深度，双手下垂规定姿势，并立有“样板”，必须仿照。

3.走路不仅也要这样弯腰，而且要喊号。

4.出门就得排队，即使到邻室亦然。

5.上午休息时和下午上工前都加了一次嚎歌，加上例行的早、午、晚各一次，每天共得嚎

五六次之多，每嚎又必是三遍。

6.抽烟时眼神不得落在书本上，看书时必须要有有一定姿势，书不得垫着写字，否则就是对毛著的污辱。

这些“革命小将”折腾“牛鬼蛇神”腻烦了，便相互吵嚷追打取乐，拿斧子砍，摆弄工厂的磅秤玩。

1966.9.7 星期三

三岁的孩子放在家里，白天请同院邻居照看一下，每天晚上回去带（妻子在房山的农村教书，平日回不来——注）。整天弄得很脏不必说，这几天又咳嗽、发烧，已经病了。有什么办法，不准请假。听说孩子每天一到天黑就叫个不停，喊“爸爸还不回来”。

可怜的孩子！

1966.9.8 星期四

革委会的××说，同学提出，有些人对人民犯了罪还拿着高薪，很不应该。要求每个人对薪金提出申请。

写了报告，自己不属高薪，申请保持原薪43元。

□ 原载《记忆》第7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